《考古工作“十五五”规划》读后

王巍

我认真学习了《考古工作“十五五”规划》，觉得这是一篇很好的规划。与“十四五”规划相比，具有质的提升。考古工作规划的9个方面，篇章布局清晰，内在联系紧密。“总体要求”“深化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做好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强化科技支撑和多学科融合”“促进考古成果共享”几部分都是讲国内考古工作。此后，讲拓展考古国际合作。然后，谈优化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最后是保障措施。我觉得是一个很连贯的、具有内在逻辑的规划。

在总体要求部分，提出在工作中要做到的诸多方面，内容非常具体，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比如“坚持学术引领，围绕重大历史问题持续攻关，以重大项目引领提升考古研究水平。”这一点是近十几年来国家文物局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即抓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特别是“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部署的21个重大项目，全面引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升了各级考古机构的研究水平，促进了相关重大课题的研究。“考古中国”的立项程序严格，要求目标明确，措施具体，技术路线清晰可行，而且一定要有跨区域跨系统的联合攻关，改变了原来课题分散、各省各自为战的情况，也改变了原来高校和地方机构缺乏紧密联系的状况。可以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对于推进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进行了五期。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研究逐渐深入，成果日益显著。这次规划提出的勾勒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文明演化图景，以及研究西北、西南、华南等区域文明化进程，以及跨区域的互动交流历程，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演进机制，研究早期王朝形成与发展机制以及区域间互动融合模式，还有开展中华文明与其他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抓住了深化研究的关键环节，力图把探源工程的研究引向深入，是非常重要的部署。我相信，在规划的指引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六期一定会取得理想的成果。

夏商文明研究工程也具有重要意义。前面有文明探源工程，后边是夏商研究工程，两者前后衔接。我注意到，规划中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列出的主要是都城性质的遗址。除了以都城为重点，工程还应该加强对夏商时期方国，特别是商代方国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重要方国的发现，这些方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实际上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也为后面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次规划把海疆文化遗产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列入，非常必要。我国沿海区域的考古曾是薄弱环节。近年来有所改观，在沿海区域有很多重要发现，沿海区域考古对于解决一系列的重大学术问题，包括南岛语族起源的研究、中华海洋文化研究、沿海地区与内陆文化互动等都非常重要。

基本建设当中全面落实“先考古、后出让”的制度，对于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城市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灵丹妙药”，改变了原来考古队伍被反复催促做发掘的被动情况。当然，刚刚开始实施“先考古、后出让”的阶段，各地方考古机构的压力很大，但一旦过了密集的先期考古工作，以后就会非常主动。将地下文物埋藏区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体系，这是非常关键的举措。还有支持一批历史文化名城率先完善考古资源“一张图”，划定公布一批地下文物埋藏区，这些都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曾经出现的问题，或者面临的机制体制的障碍，也是此次规划的重要亮点。

强化科技支撑和多学科融合。提出突出科技赋能，建设国家级考古科学实验室，形成一批考古实验室科研平台，非常重要。现代考古学的科学化进展很快，这也是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方面我们国家的考古学近十多年来进步很大。在实际的考古工作中充分显现出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科技支撑和多学科融合对于促进考古事业的发展，促进研究的深化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次规划提到多学科结合，除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外，还提到推动考古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协作，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考古学是研究人类历史文化，研究人类历史进程和探索其规律，所以必须加强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我很欣喜地看到这个规划当中提到与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资源整合，我觉得还应该有民族学和社会学，总之，这个方面提得很好。

规划中关于考古成果共享，主要是提到文物的移交，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直以来推动比较困难的。在专栏四“考古成果转化”中，主要谈的是考古报告出版，这是一项支撑学术科研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基础性工作。考古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要把考古研究的成果及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普及，要用民众能够听得懂的方式，包括通俗读物、纪录片、各种绘本读本介绍考古发现，阐释其中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要与宣传媒体方面紧密配合，对内对外进行传播。应当把考古成果的转化、传播提升到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关于拓展国际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这方面进展非常显著。中国考古“走出去”对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和当地民众和考古学界的合作乃至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次规划中提出培育5—10个中外联合考古示范项目，加强组织统筹，建立健全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管理制度，增强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的学术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非常重要。特别是“可持续性”，避免和纠正“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做法，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很有针对性的。

优化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规划最大的亮点。突破了仅仅是工作部署，而是着眼于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完善，着眼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出系统总结中国考古学理论技术方法，构建具有原创性和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学术体系。规划对考古人才的培养给予很大关注，提出若干措施，包括支持高校规范考古院系、考古专业建设，重视冷门绝学方向人才培养，着重加强高校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工作，加快布局教学实习基地建设。推进“产学研”联合培养。推动高校编写中国考古学系列教材，强化学生通识教育，全面提升学生文理素养与实操能力。鼓励高校培育前沿交叉学科，有针对性地开设外国考古课程，构建多层次、差异化、可持续的学科发展格局。特别是推动考古学精品教材编撰和高校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建设，关系到考古队伍能否后继有人。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高校的田野教育实习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还需进一步加强。

中国考古学最重大的任务或者意义最深远的任务，应该是通过考古发掘与研究，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立足更高站位，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学术支撑和精神动力。我认为这个规划内容全面，部署详尽，措施具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定会对“十五五”期间全国考古工作的全面提升和健康发展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版、四版责编：续红明　丁淑娇　李　端

建设世界一流的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

——读懂《考古工作『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转向

高星

未来五年，中国考古往哪里去？《考古工作“十五五”规划》给出了清晰而坚定的回答：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这份规划以“学术引领、系统思维、创新驱动、开放共享”为原则，把七大任务、七个专栏编织成一张环环相扣的发展路线图。表层看，它是一份行业工作清单；深层读，它藏着中国考古学从“发现驱动”走向“问题驱动”、“从国内深耕”走向“全球对话”、从“经验学科”走向“实证科学”的重要转向。其中，对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擘画尤具深意：这门研究人类百万年根脉的学科，被提升到与文明探源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承担起参与全球人类演化叙事的历史重任。

追问“人的来路”：东亚人类起源研究升格为国家战略命题

规划将“东亚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写入专栏1的重大考古研究序列，与“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并置。这一安排传递出强烈信号：在中国考古的顶层设计中，距今百万年尺度的人类演化，与距今五千多年的文明起源，已被置于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表明，国家已将“百万年人类史”作为与“五千多年文明史”并重的叙事根基来布局和推行。

这一方向包含两条主线。第一条是深化华北地区百万年遗址与人类行为演化研究，推进青藏高原人类演化过程与极端环境适应研究，进而探讨欧亚大陆相关人群的迁徙互动过程及其演化模式和路径的驱动机制。第二条同样关键：开展东亚现代人群多元化祖源群体的形成与演化研究，解析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东亚人群的演变进程，揭示黄河、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的人群从远古至近代的发展模式。

“多元化祖源群体”的表述尤其引人关注。它修正了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现代东亚人并非单一来源，而是由本土古老型人群与外来群体在漫长岁月中交流、融合而成的复合体。规划把研究视野从“人类何时到达东亚”转向“多元祖源如何熔铸成今天的东亚人群”，与近年来古DNA、古蛋白研究所揭示的复杂人群演化交流动态高度吻合。这一命题进入国家规划，意味着古人类学、古遗传学与旧石器考古学的交叉整合与证据链的对接将获得更稳定、更持续的支持和投入。

这正是该领域强劲发展态势的集中体现。近十余年，古人类化石的重要发现和高精度形态信息提取、旧石器考古学在解析古代人群迁徙互动和生存行为方面的深耕、古DNA—古蛋白测序、高精度测年、同位素分析等领域的长足发展，东亚人类演化的证据体系正从“零散材料加粗略年代”走向“化石、文化、基因、环境四方互证”的实证体系；华北百万年遗址序列不断刷新，青藏高原极端环境适应研究持续突破，东亚已成为全球人类演化研究最具活力的前沿之一。规划将其列为国家命题，既是回应全球学术界关于现代人起源的世纪争论，也是把“百万年人类史”从宏大表述落成有化石、有文化、有基因证据支撑的完整叙事。对旧石器时代考古而言，这是学科身份的跃升：从相对边缘的基础学科，成为国家科技战略与文化战略的交汇点，必须承担起为人类演化宏大叙事提供东亚证据的历史重任。

从“勾勒图景”到“叩问机制”：文明探源的深化

规划重申聚焦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与内在机制。从“图景”到“机制”，标志文明探源研究走向成熟：过去回答“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未来五年要回答“它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这一转向与古人类学研究同向而行：旧—新石器过渡期人群演变研究，正是从人类演化的纵深，为追问文明机制提供人口学与生态学前提。未来的文明探源，一定会向旧石器时代的历史纵深推进，打通“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血脉。

锻造科学底座：国家考古科学实验室与交叉学科体系

规划提出建设国家级考古科学实验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与高校整合资源和人才优势，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家考古科学实验室。“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点出了中国考古当前的短板与雄心。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考古力量分散于各院所与高校，设备、数据、标准难以贯通。国家考古科学实验室要解决的，正是把分散的“珍珠”串成“项链”：统一样本管理、数据标准与技术规范，让田野发掘—样本处理—多学科测试—综合阐释形成闭环，对标世界一流。对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而言，这一平台的意义尤为直接：人类化石的年代学约束、古DNA与古蛋白提取、埋藏环境分析、石器微痕与残留物研究，无不依赖高精尖实验条件与标准化数据。规划同时部署数智考古，制定考古数据采集标准、建设开放共享数据集、研制考古专用人工智能大模型，为石器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量化分析、遗址空间重建与跨区域比较提供新工具，从“经验型”走向“定量实证型”，从“人海战术”走向“算力辅助”。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引领性的拓展，未来更会得到重塑和新生。

筑基学科与人才梯队

规划着墨于优化考古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立足中国考古实践，构建具有原创性、中国特色考古学学术体系，实施中国考古学教材编写工程，强化高校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推进“产学研”联合培养。对古人类学与旧石器考古而言，这意味着学科梯队与理论话语的筑基，培养更多的旧石器考古专才，让未来的考古人既在探方中练出真功夫，也具备把中国材料转化为国际学术命题的能力。规划还直面“重发掘、轻整理、慢出版”的惯性，实施重点考古报告出版工程，以制度约束成果发表周期。人类化石的测量数据、旧石器遗址的测年资料、石器组合与埋藏信息若不能及时系统发表，便难以汇入国际数据库参与全球比较，这一约束对学科国际化尤为必要。

走向世界：旧石器考古的国际化实践与国际影响力

规划的第六部分释放出强烈的开放信号：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开展一批学术性强的中外联合考古项目，对外开放“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建设国际交流平台，科学布局“一带一路”境外考古科研基地。专栏5给出更具体的路线图：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重点，探索中亚、北亚、东北亚、东南亚等跨国大区域研究模式。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印证了这一方向：该所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中亚国家合作开展系统的史前考古调查、发掘，深化了史前人类在亚洲中部—东部的演化、适应、迁徙、交流研究，显著扩大了中国考古的国际影响与世界贡献。当中国的考古队伍走进中亚草原，带回来的不仅是遗址资料，更是理解东亚与欧亚大陆人群互动的关键拼图，这正是规划中“探讨欧亚大陆相关人群迁徙互动过程”所呼唤的国际视野。近年来，我国旧石器考古已从方法的学习者成长为国际合作的平等伙伴：依托东亚百万年遗址序列与青藏高原古人类遗存，中国学者在人类起源、现代人扩散、石器技术演化、木器的制作与使用等议题上持续发出独立声音，参与乃至主导国际学术对话，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从单向学习西方方法，到平等合作、共同研究、输出中国方案，中国考古正在完成一场“双向奔赴”。

一份规划，一份历史责任

回看整份规划，最动人的不是某个具体项目，而是它背后的方向感：研究重心从“发现什么”转向“解释为什么”；科技支撑从“单点突破”转向“平台化、数智化”；学科建设从“经验传承”转向“体系重构、教材筑基”；国际交往从“借鉴学习”转向“平等对话、贡献世界”。四个转向环环相扣，最终都指向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对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而言，这份规划更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中国拥有东亚最丰富、最连续的人类演化遗存序列，理应为人类演化与现代人起源的全球叙事提供最坚实的东方证据。研究“人的由来”，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源头工程，也是连接中国考古与世界考古的桥梁学科。未来五年，当东亚人类起源研究在华北百万年遗址和青藏高原上持续推进，当古DNA、古蛋白与石器分析在国家考古科学实验室中深度交汇，当中国考古团队的身影出现在境外的重要遗址上，我们看到的将不仅是一份规划的落地，更是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用科学的方法、开放的胸怀，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和构筑与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这份规划，值得期待。

（上接3版）

四、强化科技支撑和多学科融合

突出科技赋能，建设国家级考古科学实验室，依托重点考古机构和高校建设一批科技考古实验室、科研平台，形成网络化、智能化、差异化科技支撑体系。增强考古现场信息获取、分析检测与文物保护能力，推动科技测年、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人骨考古等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常态化应用。推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协作，促进考古学与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资源整合，全面提升多学科协同攻关能力。

专栏3 考古科技创新

1.考古科学实验室建设。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等考古机构、高校，加快整合资源和人才优势，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家考古科学实验室、深海考古实验室。支持山西、浙江、河南、四川、陕西等省级考古机构立足资源、技术优势，发展区域性、专题性科技考古平台，协同提升行业科研能力。

2.考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提高考古技术装备标准化水平，支持便携式分析检测、考古物探、考古测绘和数字化等专业设备配置与迭代更新。发展遥感、地球物理探测、高精度序列年代构建、痕量残留物识别、资源产地溯源、古DNA提取和分析等关键技术。支持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开展专用设备研发，推进水下考古机器人和水下文物探测、精细化发掘和遗址原址保护等专用设施装备研发。

3.数智考古研究。发挥全国考古工作信息数据平台作用，研究制定考古数据采集标准，提高考古大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能力，建设开放共享的考古领域高质量数据集。支持研制考古专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挖掘人工智能在出土文物识别、拼对缀合、虚拟修复，地理空间数据智能化采集、处理与分析，出土文物数字化展示和传播等方面的技术潜力，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考古领域的应用前景。

五、促进考古成果共享

实施重点考古报告出版工程，加强考古资料档案管理。规范考古出土（出水）文物保护修复、移交、展示和日常保管工作，推动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加强考古成果转化管理，规范开展考古研学活动、公众考古活动。发挥考古工作在文物调查、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博物馆建设、大遗址保护展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世界遗产申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主动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科学普及考古和历史知识。支持《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高质量学术期刊建设。

专栏4 考古成果转化

重点考古报告出版工程。落实重点遗址考古报告出版任务，为考古成果转化利用提供学术支撑。建立健全年度考古发掘工作报告管理制度，明确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成果发表周期、建立动态清单机制，促进考古资料整理出版常态化、长效化。推动考古档案建设，健全考古档案管理制度。探索考古资料、已发表考古成果数据化和社会共享，鼓励多种方式实现考古工作报告交流使用。

六、拓展考古国际合作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开展一批学术性强的中外联合考古项目。对外开放“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夏商文明研究工程，依托良渚、二里头、三星堆、琉璃河等遗址建设国际交流平台。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框架下，持续开展考古研究、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等工作，建立考古相关专业委员会，科学布局“一带一路”境外考古科研基地，持续加强考古与研究。推动重要考古报告和学术论著互译互介，鼓励创办外文考古刊物，促进考古成果国际传播，办好良渚论坛、上海·世界考古论坛等国际会议，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专栏5 联合考古

1.中外联合考古行动。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重点，支持国内考古机构、高校赴外开展联合考古与学术交流，探索中亚、北亚、东北亚、东南亚等跨国大区域研究模式。积极开展南岛语族、环喜马拉雅地区、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联合考古，以及古代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玛雅文明研究，与沙特、突尼斯、埃及、希腊等国合作开展水下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培育5—10个中外联合考古示范项目，加强组织统筹，建立健全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管理制度，增强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的学术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2.海外联合考古能力建设。推动国内考古机构、高校与外国专业机构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好希腊古典学研究院，支持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建设中国埃及海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中心，持续提升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建设水平，充分发挥学术纽带作用。统筹布局埃及、希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合作考古设施建设，强化功能定位、提高设施使用效能。有序推进南非、突尼斯、沙特、土耳其等国考古科研平台建设，改善中国考古海外工作条件、提升专业设施保障水平。

七、优化考古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

立足中国考古实践，加强国内外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比较研究，系统总结中国考古学理论技术方法，构建具有原创性和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学术体系。支持高校规范考古院系、考古专业建设，重视冷门绝学方向人才培养，着重加强高校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工作，加快布局教学实习基地建设。推进“产学研”联合培养。推动高校编写中国考古学系列教材，强化学生通识教育，全面提升学生文理素养与实操能力。鼓励高校培育前沿交叉学科，有针对性地开设外国考古课程，构建多层次、差异化、可持续的学科发展格局。

专栏6 考古学科建设

1.中国考古学教材编写工程。推动考古学精品教材编撰，集中呈现中国考古学发展成果和世界考古学前沿理论、学术创见。支持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出版一批满足学科培养需求的高质量教材，及时吸纳最新学术成果、填补专业教材空白。推进多卷本《中国考古学》（第二版）和《中国考古学（简本）》英文版编纂，打造标志性学术品牌。

2.高校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建设。落实高校田野考古教学实习要求，支持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高校持续建设教学实习基地，完善田野考古教学体系和评价标准，加强检查监督，切实提升学生田野实操能力。支持高校试点开展校地合作联合育人模式、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实训基地，探索数智科技与考古教学科研相结合，培养复合型考古人才。鼓励高校依托重要遗址与地方合作建设田野考古教学实践基地，支持北京大学周原基地、盐池基地、临淄基地，吉林大学夏县基地，西北大学旬邑基地建设，鼓励考古机构参与田野考古实习教学，推动高校绩效考评、职称设置和人才政策向田野考古教学倾斜。

八、加强考古能力建设

强化全国考古“一盘棋”，完善综合能力评价机制，引导各级各地考古机构高质量发展，推进重点考古机构建设。支持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设和设施设备更新，建立健全考古工地安全管理制度，规范考古工地安防监控设施、大跨度考古设施、临时库房等建设，确保安全。用好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实施好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项目、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专项，推广文物全科人才培养。加强考古机构新入职人员培训，逐步建立在职人员培训、轮训机制，加强边疆地区考古队伍能力建设，遴选培养考古青年英才、战略科学家，形成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实施考古探掘工国家职业标准，逐步完善考古技能人才职业技能培训与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专栏7 重点考古机构建设

着力提高国内考古机构的学术科研、国际合作、管理创新和队伍建设水平，扶优扶强，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对标世界一流标准加强能力建设，重点培育陕西、河南、浙江、山东、四川等省级考古机构，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集中投入，充分发挥行业带动和示范作用，增强国际学术对话和竞争能力。

九、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积极争取宣传、统战等部门支持，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外交、教育、科技、人社、自然资源、住建、水利、交通、农业农村、文旅等部门协调，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加强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政策保障。

综合运用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等多渠道经费，增加科技应用、科技装备、文物修复、研究阐释、成果转化等方面投入。健全考古项目经费使用和绩效考评机制，切实保证资金的科研效益、社会效益。

完善规划实施机制，推进规划落实。坚持“一盘棋”，加强本规划与其他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衔接，进一步完善考古行业技术标准体系。国家文物局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重点项目。省级文物行政部门细化方案和职责分工，做好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保障，加强项目管理，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报告。

出版单位：中国文物报社有限公司　本社社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电子邮箱：wwb@zgwwb.cn　邮政编码：100007　总机：（010）84078838　发行热线：（010）84079040
广告热线：（010）84079692　周二、四、六出版　零售价：2.00元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